

年卷

第

1

第

8-16

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五日出版

三民主義周刊

第一卷 第八期

本期目次

論戰爭與革命

所謂否定的否定

以民生主義為目的之政治建設要義

與王芸生論政體問題

論彈劾趙錕

凱術斯強迫儲蓄計劃

楊公遠

王冠青

饒榮春

李準

馬季康



三民主義社
社址：重慶中二路
電話：二一〇
發行所：重慶中二路
定價：每冊一角
半年二元四角

本報刊行航空版
香港 桂林 西安 金華

論戰爭與革命

楊公達

中國向來講求修睦之道，終歸重信義，凡已既不欲者，勿施於人，而已之所欲者，必施於人。中國素以和平立國，惟其和平，所以對於戰爭觀念，極為淡薄，故非戰思想，實淵源於中國。「爭端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中國所深惡痛絕的；好大喜功者，弱英雄武者，在中國歷史上亦沒有過好評。這些，足以說明中國一貫的和平思想，也可以說，一貫的非戰思想。

什麼是「非戰」？非戰是人類的最理想，終極境地；非戰是安把戰爭，其體範圍以外的。一九二八年的凱洛克·白里安公約，即非戰公約，具體的規定了一不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的工具，如果國與國間發生爭執，應以調停或仲裁的方式求其解決。十餘年來，整個世界雖不幸而兵連禍結，然我們敢相信，非戰的崇高意識，仍深刻地牢不可破地蘊藏於人們的心坎中。

但是非戰並不是反戰。反戰這個名詞太籠統了，太難談別是非曲直了。非戰是不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的工具，並不是任何戰爭皆在反對之列。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的工具，這種戰爭是侵略戰爭，侵略戰爭不特應該反對，且應起而抵抗之，制裁之。抵抗與制裁的戰爭，是自衛戰爭，是正義戰爭，不特不應談反對，且應從而頌揚之，援助之。進一步說，非戰的觀念不為人所當重的時候，還須用正當的戰爭以克制那種征服主義，藉以發揚非戰的精神，乃至實現非戰的目的。

因此，中國這個禮義之邦，雖然始終為着「天下為公世界大同」而奮鬥，但在歷代，凡遇侵沙之來，誰不起而應戰，而此種應戰，類皆能驅逐敵寇於國境之外。誠以信義和平與明恥教戰是並行不背的，惟其講信義，所以要明恥，惟其求和平，所以須教戰。信義和平乃立國之本，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出版

明恥教戰是國防的建設。故「以不敵民戰，是謂棄之」。我們四年來的對日抗戰，極度發揮了中國民族的毅力，我們已獲取的光榮繁榮，與其歸功於這毅力的堅韌性，毋寧歸功於這毅力的潛在性。這種民族的潛力，來自信義和平的素養，其在平時似乎只具指晦的作用，但為了維護生存保障獨立而戰時，則極自然地，極慎久地，蓬勃爆發，無聲息的間歇。因為「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到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時候，真是師出有名，有名之師一出，是為仁義之師，則民心之強，士氣之旺，歷久彌堅。這便是說，中國民族潛力的偉大，平素為世人所忽視，尤為日寇所不察，七七之前，日本朝野確有「對華再認識」的呼聲，而日本軍閥們充耳不聞，將現在，纔恍然了，總覺悟到中國應戰不求戰是顛撲不破的至理了。

當今我們的抗戰，消極目的在爭取和平，完整我主權，積極指撥在完脫國民革命，建設新中國。平因我們所以我們進行的戰爭，已不是單純的抗戰，而是全面的革命戰爭。這在實際的困難，自較單純的抗戰所遭際者為多，但是任何困難在革命正氣磅礴之下，在革命主義深入人心之下，必能克服；任何橫逆，不論來自何方，必能忍受，任何惡勢力，不論惡化的程度怎樣深，和惡化的技巧怎樣多，必能洞燭其奸，予以掃除。革命黨人是不怕任何挫折的，困難愈多，革命的情緒愈高漲；革命政府能發揚光大其大智大仁大勇，是不畏任何強暴的，強暴的攻擊愈猛，鎮壓的辦法越多。蓋革命的大業，多在攻攻的局面中長成，以至於完成。

以蘇聯的革命為例來說，當列寧倡導革命的時候，外有列強的重圍，內有反動力量的作梗，而歷盡艱辛，卒底於成。再以中國的國民革命

來說，當初一面須與帝國主義者鬥爭，一面又要和北洋軍閥作戰，在革命的敵人環繞圍攻中，北伐終告成功；如今一面與日寇死拼，一面又要孤戰孤守，組織和一切破壞抗戰阻撓建國的毒莖，處這種艱鉅的形勢裏面，革命黨和革命政府，毫無置疑地，必能忍辱負重，濟此時艱，達成抗戰建國的使命的。

意志是日趨覺悟了，征服中國的心已成過去了，我們固然該加倍努力，以求速到，但我們也不要開視或輕輕放過了那些與日寇或時時暗有或無形互相呼應的民族敗類。這些敗類，遍地皆是，無孔不入，或是明目張膽的漢奸，或是變相的割據主義者，或是巧立名目的偽領袖，或是隱居居奇的好商，且如過江之鯽，不勝枚舉。我們對這些敗類，應該一一舉發，政府尤應依法予以制裁，不稍姑息。

所謂否定的否定

「否定的否定」，是唯物辯證法的第三法則，其第一法則「矛盾統一法則」，第二法則「質與量的變化」，作者已在本刊以前各期加以分析與批判，現在更對這第三法則來下一番檢討的工夫：

「否定的否定」，雖是唯物辯證法的第三法則，實際上却是第一第二法則的總合。所以他們認為：「否定的否定的法則，是一事物向其對立物轉化的全過程，這一法則包括着當做全體看的全過程」。恩格斯指出辯證法根本法則的特徵說：「當嚴格地建造他的全體系統的時候，是絕對的否定的法則，當做根本法則去做工作的。否定的否定的法則，則是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法則」，同樣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也就是唯物辯證法的「眼目」和「核心」看的「對立統一法則」的發現和具體表現。那裏，以前我們對於那當作辯證法眼目和核心看的「矛盾統一法則」及「質與量的變化」，既已根據民生哲學與三民主義的眼光，嚴密評定

三民主義週刊

藉視政府法令的人，不僅政府應依法予以懲處，凡國民亦應奮起而攻之的。至於故意違法抗命的人，政府的法令權力不能奏效的時候，政府已仁至義盡莫由再寬大的時候，那只有明令制裁，以維國家的紀綱和尊嚴。政府這種行動是裁亂，自然不是什麼「內戰」。

抗戰，討伐和裁亂，都是以仁伐不仁。鯨鯨在前，不容黃雀在後，誰說不應對敵作很之徒斷然處置呢？誰又會說這種斷然處置是什麼內戰呢？果如這樣說，那只是日寇的詭計，在企圖中出我們，分化我們，及轟惑人心，淆亂國際視聽，是不懂識者一笑的。當一個國家對外抗戰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候，假如有人想來乘火打劫以遂其陰謀的話，那只有採取革命的手段來廓清一切障礙。必須這樣，纔能整肅抗戰的陣營，保障抗戰的勝利。

王冠青

了它的非得失。現在我們對於這當做辯證法全過程的「否定的否定」法則，自然該有進一步的檢討與批判。

「否定的否定」之法則，從表面上看，幾乎好像是完全不錯的。譬如在自然現象上看，春天否定了冬天，夏天再來否定春天，在歷史事實上，秦朝否定了周朝，漢朝又來否定秦朝；却是很普通的例子。至於就唯物的觀點而言，他們以為「由麥粒發芽到結實，以至於麥桿的死亡，這一發展過程，就是否定的否定」。因為結實否定了發芽，麥桿的死亡又否定了結實。由此類推，人生是由幼年壯年否定，最後又被衰老死亡否定了壯年。是這樣「否定的否定」一律的推行和運用，其結果有時竟是死亡哀誠，照民生哲學的眼光看來，假如用人工去加速「否定的否定」之結果，有時竟是含有很大的危險性的。幸而唯物史觀者，將「否定的否定」之法則，用於人類社會的時候，僅僅限於「資本主義社會

三

吾黨封建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又未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段。如
果不幸而將此定律，運用到民族發展方面，論論的結果，很容易成爲民
族而否定了民族的萌芽，最後却被民族滅亡來否定民族的發展，正
如他們夢裡死亡之一例一樣。因爲「否定」的法則，也如矛盾統一
和質量變化論一般是盲目的，它的結果，有時或許是生存發展，有時
或竟是衰滅死亡！

現在我們必須根據民生哲學的眼光，對於「否定」的否定「一」法則
所引起的陰暗觀念，加以正面的評判與澄清。我們認爲「否定」乃至「
再否定」的現象，的確是宇宙和社會間常有的，不過在民生哲學最高標
準的光明照耀之下，同樣的「否定」或「再否定」之間，却是有非得失
孰利孰弊之分。「否定」不是完全值得擁護與讚頌的，有時人類必須拒
抗否定打擊否定，乃「消滅否定」乃能發展與生存。否定不是全都成功
的，有時因爲某種「否定運動」的失敗，才保障而且增進了人類社會的
生存進化。我們以爲依據民生哲學，同樣的「否定」公式當中，至少有
下列不同的區別：

甲、是「否定」的否定「一」否定「一」不一定完全是對的，有益生存的否定
「一」是「否定」，而有「否定」的否定「一」非「否定」。「雙頭仍用麥
粒發芽的例子來說，當麥粒發芽之後，有兩種情形可以否定發芽的
現象。其一是由發芽而發展成麥根與結實，使發芽的現象成爲過去
而消滅。其二是因天災蟲害等原因，使麥芽夭折而消滅了發芽的現
象。前一種否定爲「一的否定」，「一」有益麥種生存的否定；後一
種否定爲非「否定」，「一」有害麥種生存的否定的眼光
看，是後一種否定，才是真正的否定，因爲它真正否定了麥種的
生存。前一種否定，與其說是否定，無寧說是發展。因爲無論麥芽
麥種乃至麥的結實，表象雖然變化，而麥這一種植物的基本性能並
未改變。麥芽是麥，麥種是麥，而麥的結實還是麥。由於麥的基本

性能未被否定，所以麥的結實有再發芽的可能。而且在再發芽的時
候，原來的一粒麥種變成了多數的麥種，這是麥的生命向擴展而不
是否定。從麥的發芽以至麥的再發芽之間的各種過程，乃是麥的生
命隨着時間進展的表徵之一環，我們所注意的是麥的生命的進展，
而不是這種表徵的更迭。所以在民生哲學的指示下，我們應該尋求
如何從積極方面，促進生命的發展。消極方面抵抗生命的否定。對
於麥子乃至其他穀物，「總理在民生主義中便指示我們要如何從積
極方面改良種子增加生產，消極方面抵抗天災防止害蟲，民生哲學
的結論，就是這樣平易可行的辦法。至於唯物辯證法的觀察，却以
爲麥的結實和麥的發芽是一個矛盾鬥爭，麥稈的死滅和麥的結實又
是一個矛盾鬥爭，麥實以否定消滅麥芽爲快，麥稈的死滅和麥的結實又
消滅麥的結實爲快，於是把握否定強調否定促進否定，而否定的結
果，有時竟是大背民生哲學目標的死滅。這種否定正是我們所謂非
的否定，這種否定的成功，就是民生乃至宇宙間一切生命的失敗，
反之，這些否定因失敗，才是民生乃至一切生命的進展。

乙、成功的否定與失敗的否定「一」否定「一」不一定是完全成功的，有時因
爲否定的失敗，人類社會才有進化。就中國的歷史來看，周漢唐三
代是民族文化比較發展的時代，這三代一方面否定了前代，一方面
更能抵抗對於本身的否定，使這種否定的否定歸於失敗。所以「一
統」一之後，便有數百年和平建設的時期，使當代文化得到長足的進
展。周朝否定了殷朝，同時外面雖戰，內而管蔡又起來否定周朝。
周朝是在外抗禦狄內平管蔡，使新的否定歸於失敗，然後才有數百
年的和平進展。漢朝否定了楚項，同時外面匈奴內而諸呂又起來否
定漢朝；漢朝是在外抗匈奴內平諸呂，使新的否定歸於失敗，然後
才有數百年的統一發達。同樣的，唐朝在否定了隋朝以後，外面雖
突厥內而建瓦，也是變亂紛紜，更是在不斷的抵抗否定，使新的否定

歸於失敗，才能在和平統一之中，求民族文化的成長。另一方面秦朝否定了周朝，却不抵抗楚項的否定，楚項否定了秦朝，又不能抵抗漢朝的否定；因為彼此否定太速；而且每個否定都是成功，而其能抵抗新的否定，當時文化便只有退步而沒有進展。晉魏六朝，隋唐五代，都因為陷於「否定的否定」的急旋紛亂的運轉當中，所以弄得國家衰亂，民族危殆，社會文化只有退步而沒有進化。就現代革命的進程而論，俄國革命之後，否定了帝俄的專制，然而內而反動的革命的拋亂，外而列強的壓迫，又要來否定定俄國的新興勢力，蘇俄因為能抵抗新的否定，所以才能使三次五年計劃逐步完成，而造就蘇聯國家和平建設的進步。特別是在中國，自總理倡導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否定了當前的吳族統治，否定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更否定了未來的個人資本主義，奠定了一勞永逸的建國基礎以來；但是內而軍閥及各種反動勢力，外而日本帝國主義，又起來否定三民主義否定國民革命。我們必須集中全國革命力量，抵抗一切新的否定，使一切新的否定歸於失敗，然後三民主義的國家建設，乃能成功。但是被總統的一否定的否定一庸淺說法所述對的人們，不知道否定有是非之分，成敗之別。以為一切否定都是對的，只有否定成功，社會才有進步，一天到晚在矛盾和否定的辯證漩渦之中，對生活找出路。不知道本身所從事的事業的否定工作，只有失敗，才是國家民族的成功。而辯證的否定工作一天不能制止，便是社會一天不能進步，國家一天不能安甯。

正確與否定的否定 正確的否定，是消除生存上病態的否定；正確的否定，是矯枉過正或無病而藥的否定。正確的否定與前所稱「是的否定」，性質並不完全相同。例如麥的發芽被麥的結實否「是」的否定「是的否定」，實際上乃是生命發展到新階段，舊階段自然成爲過去的現象，就生命的本質觀察，乃是發展而非否定。另

外如天「害」的發生，即所謂非的否定，乃是真的對於生命的否定。非的否定既然發生，我們爲抵抗非的否定以保障生命而奮鬥，就是用抵抗天災的手段來否定天災，用防止害「害」的手段來否定害。這種否定「非的否定」，乃是正確的否定，一醫治生存病態的否定。總理倡導民族主義來否定國際上不平等的病態，民權主義來否定政治上不平等的病態，民生主義來否定經濟上不平等的病態。中國古代的湯武革命是否定桀紂的暴虐，近代歐美各國的政治或社會革命，是否定其本國政治上經濟上的病態，這些都是正確的否定。但是否定也時常會誤的，誤的否定和「非的否定」性質也不完全相同。一非的否定，根本以消滅生命爲目的，誤的否定雖不以消滅生命爲目的，但是因爲否定運用的誤，其結果也足以妨害生存。誤的否定的第一種典型，就是矯枉過正，以暴易暴。秦始皇的暴虐是應該否定的，但是項羽否定了始皇以後，仍然代之以暴力，所以又被漢室否定。法國大革命以後，一度暴民專制的矯枉過正，因此使法國革命發生多次的波折。誤的否定的第二典型，便是無病而藥或藥不對症。譬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其目的根本在於消滅中華民族的生存，這是一種「非的否定」。但另外一部份誤的殺傷，却想用社會革命來否定國民革命，此種誤的否定，雖不以滅亡中國爲目的，但實際上妨害國民的生存進展則同。社會革命在俄國，曾如是冬天的箭，消滅了帝俄專制的毒害。社會革命在中國却成春夏之交的毒，妨害了國民革命之花。現在冬天是否定毒的藥，但到春夏之際，却成了毒害國民的毒。物成成長的誤的否定。

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一個包含着國際政治經濟平等各種優良種子的花筒；進取者主義者所祈求的經濟平等的種子一併包括在內，而且民生主義所含經濟平等的種子，比較其他舶來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種子，特別適合於中國的地宜。總理領導本黨的宗旨，

所以用民生主義來否定國家不平等以後，却不可流於恢復國家威權帝國主義；用民生主義來肯定了政治不平等以後，却不可流於暴民政治或過激的政黨政治；用民生主義來肯定了經濟不平等以後，却不可流於階級專政或忘記民族立場而成為國際主義的附庸。一否定的否定法則的信徒，一味強調否定，結果固然很容易矯枉過正。而矯枉過正以後，自然需要再被其他正者來矯正這種「矯枉過正」，而矯正經過正者不服正音的矯正，反誣指正為不正，更欲以自己的過正而否定否定者，於是發生無病而藥，以病治藥的現象。使原來很容易由過而自自動改正的「過正」，更因以一錯而造放與正者為敵的大錯與特錯的否定。用階級鬥爭階級獨裁的手段來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是

以民生主義為目的之政治建設要義

饒榮春

民生主義為近代政治建設的目標。政治的內部，分析起來，雖然包括經濟、教育、倫理、法制、社會、軍事、交通等等，但綜合起來，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字，所謂「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國家的生命」，一切政治設施，無非要使「國家富強，民生康樂」，必須能夠如此，才達到政治的目的。總理對於民生主義的遺教，只講了四條，沒有講完，例如講人民的生活，只講到「食、衣、住、行、」，遺教季陶先生講，還有「育、樂」的問題，不曾講到。但民生主義的要義——關於經濟建設所指示的根本政策與原則却指示得明白，就是「以和平手段，採（一）平均地權，（二）節制私人資本，（三）製造或發達國家資本三個途徑，由國家通盤籌劃，全體國民協力合作，來完成經濟建設，解決整個國計民生問題。」

中國民生問題之所以發生——國民經濟落後破產的原因，不外下列三點：第一、由於中國的民族不能完成獨立自由平等，經濟方面受着資

事來之政治經濟，由國家通盤籌劃，全體國民協力合作，來完成經濟建設，解決整個國計民生問題。總理在民生主義中加以指正。中國共產黨在十年間矯枉過正的。總理在民生主義中加以指正。中國共產黨在十年間實行的失敗以後，放棄了階級鬥爭的手段，宣言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放棄了本身的過正而接受了。總理的指正，這一改過遷善的表示，是值得我們稱頌的。我們希望以後不再有用其他主義來否定三民主義的錯誤否定的發生，如果再有這種事實發生，那就是一錯再錯，大錯特錯，而其原因則由「正誤不辨」。

最後，我們以為「否定」或「必須否定」的現象，的確是常有的，不過「否定」的本身是盲目的，我們必須對於各種否定，先求明是非，分過與不及，辨正與否，只定我們的取舍標準。而衡量這些是非成敗正誤的最高唯一標準，就是三民主義的民生哲學。

本帝國主義的控制，以致關稅不能自主，外貨充斥內地，使經濟發展的趨勢，論為次殖民地的地位，而不能自由發展；第二、由於國內封建殘餘勢力的摧毀，使中國經濟的組織，不能擴大為整個的國民經濟，而且使原有經濟組織逐漸衰微崩潰，而停留於落後的狀態；第三、由於國內政治未能早日完成真正統一的影響，使國家整個的經濟建設，無法順利進行。因此，要求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實際實現民生主義，而且同時實現民族，民權主義，方可達到目的。臨全大會宣言有云：「民生主義之實行，當於抗戰期間求之，且當於此求得抗戰之勝利，決非俟戰勝之後，始從事。民生主義之開始，」就是最好說明。

關於民生主義在政治建設上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總理在建國大綱第二條頭一句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看得出來。民生就是政治建設的中心目標，總理在早上年上李海章書中，以「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為治國的大經大本，便是從民生上

看眼，要做到人無私民而各盡其才，地無荒土而咸盡其利，物無廢棄而各盡其用，實無待而用得其宜，才是政治的大成功。中國古來，無論那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莫不以民生為政治的大本。漢書所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孔子主張「足食足兵，既且且庶」，孟子說：「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又謂：「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可見一國的政治，必須是民生主義的政治，現代的政治建設，必須以民生主義為目的。

民生主義的要點：第一、以民生史觀為出發點，尋出經濟現象發展的法則，認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求生存才是歷史的重心，也才是人類進化的原動力，所以民生主義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國家的生命一個最合理的解決方法。第二、以農民為目的，其所倡導的經濟利益，是以生存為中心，人民為對象，以社會為領域，以國家為經紀，採取政治上和平漸進的辦法，由私有私營的經濟，辦到國有國營的經濟，再由國有國營的經濟，辦到公有公營的經濟，造成民生治民享的新共濟社會；第三、根據儒家「天下為公」和大同的理想，認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衝突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衝突，所以主張互助的或真實的共產主義，由階級協調達到消滅階級，與馬克思的爭鬥的共產主義不同；第四、生產與分配同時並重，一方面事先消滅資本家生產方式所支配的社會因素，一方面消滅階級，免除社會主義革命主義革命條件的形成，採取漸進的和緩的辦法，達到理想的大同社會。

民生主義第一個具體實施的項目，為「平均地權」，以解決土地問題，達一個徹底的民主革命的土改政綱，便是解決民生問題的起點，而為民生主義的實質基礎。解決土地問題有兩個意義：（一）使土地的分佈適當，（二）使土地的生產增進，而前者又為後者的根本問題，分配

其地，得解決，增進生產便從談起。實施平均地權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可歸納為四點：（一）土地照價收稅，照價收買，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按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二）土地漲價歸公，自報價之起，若土地因政治的改良，社會的進步，增加之額，則其利益即歸公，以防止土地為少數地主所壟斷的弊病；（三）實行耕者有其田，創定自耕農制度，使佃耕地的所有權，由地主之手轉移於佃農之手，使佃耕的佃戶，都進而為自耕農；（四）土地國有，達到人民共享土地所生一切之理想。這就是平均地權的實施步驟，所謂其土地的分佈適當，不是僅做到「耕者有其田」的各個同均均，就算解決，還得要再進一步，使土地農有轉移至土地國有，那發達到集體上的均方為圓滿。這種方法是漸進的，與共產黨的沒收土地或「平分土地」的收策不同。

民生主義第二個項目為「節制私人資本」，這一項與平均地權，同為實現分配社會化的必要條件。民生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統制經濟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對資本的運用。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在平衡生產與消費，追求利潤，維持私有制度；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廢除私產，一切企業公有公營；民生主義計劃經濟則在於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私產不須廢除，企業可以公有公營，亦可以私有私營，惟私有私營者須受公營的節制，使勿以私害公，以小害大而已。實業計劃的第一計劃中有云：「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託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託個人及有獨佔性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又陳金真言有云：「抗戰期間關於經濟之建設，政府必當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施行計劃經濟，凡事業之宜於國營者，由國家籌集資本，從事興辦，務使之趨於生產的合

理，其宜於私人企業者，由私人出資舉辦，於國家整個計劃之下，受政府的指導獎勵，以爲有利的發展。私人企業既因國家的銀行與重工業受通網之發達而速其生長，則於節制資本的目的既無違背，而私人的企業心亦得滿足，不惟直接關係國防的經濟事業得以活潑進行，即關於社會普通繁榮的事業亦因以發展，使最大多數人民生活之水平線，得以顯長增高。由此可知在民生主義計劃經濟之下，各級政府（即公家）與私人各有其活動之範圍，而在各自活動範圍之內，乃有整個計劃發展之，協調之及統制之。

至於節制私人資本的辦法，總理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提出了四點，曰：「總之歐美各一平來進步的事實，總理極端贊成的：（一）社會與工業之改良；採取「工業管理」政策，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教育，保護工人衛生，改良工廠設備；總理認爲這是與雙方有利的，說：「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爲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生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二）逐漸與交通含有獨佔性的企業收歸公有；（三）直接徵稅；用累進稅率，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發展國營事業，及改良工人教育，衛生和設備；（四）分配之社會化；逐漸打倒個人買賣制度，消滅商人的壟斷，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或由政府來分配（如消費合作社及市政府所辦的公用事業）。這四種辦法，可以說面面俱到，不特可以防患未然，使私人資本受到相當限制，不致於走上「寡制」之途，工人階級困苦萬狀，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對於促進工業建設也具有決定的作用。如第一項社會與工業之改良是使資本家與工人俱獲其利的辦法；第二項逐漸變通事業及大企業收歸國營，是使工業國有化的途徑；第四項分配之社會化，是在求得生產與消費的均衡，消滅商人的居奇壟斷，更是使生產合理，工業前途趨於有利發展的一法

。總理在民生主義第一講說：「實業的中心，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就是這個意思。

民生主義第三個項目是製造或發達國家資本，這是民生主義的實業政策，從積極方面使經濟建設達到生產合理化社會化的唯一道路，而其最大目的，則在於發展國防工業，促進民生工業，所謂「國防與民生建設」，使國民經濟日趨發達，人民生活得以改善。關於發達國家資本種種積極方面的意義，總理闡釋得甚爲明白：「積極方面，在建國方略中已有云：『中國今尚用手工爲生產，必須兩種革命同時並舉，既在工業而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以營其巨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糧食，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其運輸，』發展其公用事業。『消極方面，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說道：『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私人來經營，將來也要產出大高價的物不平均」，又在建國方略中說：「惟所防者，則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致生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耳。防之之道爲何？即凡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歸國家經營，以所獲利益，歸之國家公用，歸之國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歐美今日之覆轍，甫經實業發達，即孕育社會革命也。此吾黨所主張民生主義之實業政策也。可見發達國家資本，積極方面在利用統一國有的大企業，擴張生產，圖強致富；消極方面是限制私人資本的一種手段，防患未然，使大資本家無由發生，致生社會階級，孕育社會革命。而此種主張，又是具有與民生經濟建設相連貫的，是民生主義的補充，並不同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在政府收買大工廠之股本，以消費者及勞工之代表，組織委員會管理之，或由國家派人管理，權利歸於國家。此種主義，既無一貫的目的，實爲資本主義壟斷政策的變相，或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總理民十年的北伐宣言

民國十三年北上的宣言所載「六條綱領」的前四條有云：「一、中國關於國際平等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良之機會；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此種改善人民生活的高遠理想，便是不約而於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明證。

發達國家資本的具體辦法，詳載於實業計劃一書內，總理對於發展中國實業，有六個大計劃：（一）以北方大港為中心，分爲建築北方大港，建築西北鐵道系統，殖民於蒙古新疆，開發遼河，開發河北山西煤礦，並設製鐵、煉鋼工廠等五部建設；（二）以東方大港為中心，分爲開闢東方大港，整治揚子江，建設內河商埠，改良揚子江系之水路及運河，建設大士敏土廠等五部建設；（三）以建設南方世界港為中心，分爲建設南方大港，改良廣州水路系統，建設西南鐵路系統，建設沿海商埠及漁業港，創立造船廠等五部建設；（四）以建設中央鐵路系統

為中心，建設東南鐵路系統，東北鐵路系統，高原鐵路系統，以及關於機關車、客車、貨車製造廠的建設；（五）關於糧食工業，衣服工業，居室工業，行動工業及印刷工業等的建設方案；（六）關於開採礦產，設立礦業機器製造廠及冶煉廠的建設。這種偉大的建設方案，便需要發達國家資本或主權的利用外資來積極經營，所謂「運輸與交通及含有獨佔性的企業將歸公有」，就是指的這幾部份。

明白了這些，就知道民生主義的偉大處，在於補偏救弊，它、民主革命更高度的政綱，它使資本制度發展而不約而於資本主義，并否定私有資本制度經濟組織的構成；它具有共產革命的終極理想而無須採取鬥爭方法，衝破社會主義的門戶；它以民主革命為中心，適應中國經濟落後的環境，完成三個時代問題；即向後進行產業革命，使生產力發展，向外抵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生產關係上使中國免除次殖民地經濟的運命；向前迎接社會主義的前途，達到全人類理想的大同社會。中國政治建設，無疑義的要以此為終極目的，才能真正的達到「民治民享」的理想政治制度。

與王芸生論政體問題

李 隼

芸生先生：

在前論「體問題」以前，有兩個流行於現在一般人心中之觀念，須先聲明為錯誤，以作進一步討論之前提，今依次論之。

一、一種政體之絕對價值並不足為一個民族應採用此種政體之充分理由。

何謂「絕對價值」？乃與「相對價值」相對立之名詞，絕對價值為一切事物其本身原來所具之價值，不因環境及對象之改變而發生變動。

相對價值，則常依環境及對象之不同而變動。例如各種物質之比重，無論何時何地均為永不改變之值，此比重值即各物質重量之絕對價值。但同一重量物質，若合強弱各異之人分別舉之，強者覺其甚輕，弱者或覺其重不可舉，在此則輕重二字為該物質重量之相對價值，此價值因其對象之不同而變動。

絕對價值及相對價值外表雖頗近似，但其性質截然不同，不容混淆，若不加以明辨，則所有事物，必發生不測我們期望之結果。例如菜蔬牛乳，同為食品，其營養成分，互相比較，自不能無高下之差，表示此

高下之差的數值，即爲此各食品之營養成分之絕對價值。但若有患胃病者於此，醫生爲其選定食品，決不能以此絕對價值爲標準，因營養之成分雖高，若爲病者之胃所不能容，實然與之轉致增損。政體之與一國民衆之關係，亦可以此種概念說明之。一種政體之進步與否，乃以此種政體與其他政體互相比較而得之結論，並未將此種政體與其對象之關係亦包括在內。所以進步二字所指者乃此種政體之絕對價值，並非其相對價值，所以當我們說某種政體是進步的政體時，須注意這句話僅是說這種政體是進步的，並非是說這種政體對任何民族都適用。因爲每一民族均有其各不相同之民族性及傳統的道德思想，以及其他與政體有關之條件不能不詳加注意，此各條件以後當再討論。

二、領袖政體不一定是非民主的。

現代中國人心中所流行的關於領袖問題的第二個錯誤觀念爲將領袖政體視作近似專制君主政體之稱政體。因此每目領袖政體爲非民主爲開國專制。故言及希特勒墨索里尼刺致譏斥，則法西斯及納粹之名即生反感。欲糾正此種錯誤思想，不能不先討論民主政體及專制君主政體在本質上之異同，而後再以現代之領袖政體與之比較，以觀何者與之近似，專制君主政體其君主之地位，或由世襲，或由武力所造成，其君主之政治行動，不受任何方面之約束，其君主之行政施設不必一定徵求人民之贊成。民主政體正與之相反，執政之人選，政府之政治施設，在在須以民意爲依據。而執政者及政府之政治行動，尤須受憲法之約束，不容除軌。今再觀察今日實行領袖政體之德意二國領袖政體成立之經過，墨索里尼取得政權甚早，始不論希特勒取得政權尚不甚久，其經過我們豈不致忘記，希氏不過上次歐戰之退伍軍人，無財無權，僅憑個人口舌之力，向德國人民宣傳，其政治之理論取得國民之信仰，及黨徒進而執掌國柄，他的政治設施，在未執政以前，早已於其所著之「我之奮鬥」中闡明其綱要，以求求國民之同意。當其執政之初，雖大受國外輿論之譏

評，但在今日已成效大彰，雖由贊同民族性之強，但亦可反證其政治施設無疑的受德國大多數人民之贊同擁護。我們決不能以德國革命中曾被禁者來證明其不得民心，因爲在獨裁制下，其基本之原則爲命令及服從，政府對少數之反對者除置之集外，亦無他道。德國之領袖政體可知現代之領袖政體與專制君主同爲一元政體，其政治領袖之政治行動成立之經過則此，動，同一不受任何方面之約束，但其本體則即近似民主政體。因其領袖之取得政權，成立此種政體及執政後之施，方針，均事先取得國民之同意。觀此則知近代領袖政體決不能視作古代專制政體一類，更不能以之爲開國專制。因此種政體之發生，自有其歷史背景，國會議之民主政體，遇其所不能克服之困難，乃演進而成領袖獨裁政體。古代專制君主政體之發生，純出乎自然，非由於民族之意志，近代領袖獨裁政體却純爲民族意志之產物。故領袖政體若欲爲之得一最爲合適之名詞，與其稱之爲非民主的政體，不如稱之爲一元式之民主政體或集權式的民主政體，而與英美之會議式的民主政體並立。

若再就歷史方面觀察，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世界各國政體自專制君主政體演變而成會議式的民主政體。自上次歐戰以後，會議式的民主政體已漸形落伍，而由領袖政體代之，其演變之因素，試一披閱近世史乘，亦未嘗不條然可尋。會議政體之所以興，因當時各民族之主要目的，在解除內部羸弱君主之剝削壓迫，此法國大革命之意義。領袖政體之所以興，則因各民族間之生存競爭日漸加劇，汗穢之會議制度已不足以應付此日漸複雜之環境，非有集中國力統一全民意志之政府不可。此希特勒墨索里尼取得政權之意義。概括言之，前者爲消除國內之不平，其目的對內的成份較多，故會議政體其組織原則，著重於防止執政者之權力過於龐大，以故重新造成國內之平等，或者一個野心家如拿破崙，故其組織之力量係分散的。後者則爲增加政府之行政效率，以求能對外作做強強之鬥爭，其目的係對外的，只求對外勝利，其他均所不計。故其組織原則正與會議政體相反，而著重於執政者權威之增高，政府力量之集中，而其國民知識水準之高，亦已達到上下信任，不安生猜疑之程度，領袖人物一切聽政命令，國民均能明瞭其目的性質，而能自動服從執行，故可不拘拘於小節而獲得會議政體所不能及之效率，若就此點

國家領袖政體，實為較會議政體進步者。

領袖政體之比較進步之政體，但以此並非不足為中國應採用領袖政體之理由，一種政體之絕對價值，並不足為一個民族採用此種政體之根據，前已論之，所以我們應再就中國與各種政體之條件詳加討論，以觀察中國究竟宜於何種政體，普通論之，一種政體之發生，均有其發生之原因及不可不行此種政體之理由與實行此種政體之條件。一政體發生之原因至為簡單，以其為成立政府最簡易之方式，故世界任何民族歷史，莫不曾經過二元政體之階段，因其最易集中，故行此政體者甚多，應付外患最敏捷，故每當一民族環境較為惡劣或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極重大之改革時，均以一元政體較為適宜。蘇俄之以領袖政體實行五年計劃，德義之以領袖政體行國家經濟，均為明證。其所需之必要條件，為須有領袖才幹人格威望之人物，至於會議政體則在與領袖政體相反，其所需者不是雄才大略之人物，却是急切不厭外患侵入的國際環境，因為人類教育不論如何進步，終是愚庸者居多，在會議政體的政府中，多數庸人每足就少數有遠見者之肘。近幾年來，美國情形便是實例，但亦因其幸而立國於西半球，故未見其弊。會議政體之發生，本可視作歷史上的特例，必適在如美國之獨立於西半球，或英國在戰勝西班牙海軍後，獨統海洋稱霸之環境下，方可久行不弊，若環境改變，則當改其政體以適應環境，古代希拉之雅典帝國及今年以前之法國，即因不能改善其拙劣之會議政體，致於敗亡，以上僅就其各方面觀察，已覺今日及不久之將來之中國，不宜於會議政體，若再就其各方面觀察，當可更發見其理由，可以證明中國在今日及不久之將來亦不能行會議政體。

（一）再提出一問題，何以中國在歷史上始終未曾出現過會議政體之存在，但即如前古曾本處於一種近於孤立的環境中，本適宜於會議政體之存在，並對於此原因現在是否仍存在，據我個人觀察，其原因有三：

（一）民族性的不同：西洋人的性格一般的都好議論不容異己，絕少獨斷妥協，正與中國人相反，拉丁語語有「公理所在必須爭鬥，即世界萬物之發達亦所不惜」。（原文僅一句俄中文非如此不能表其意）羅馬既一國萬國後即趨於太甚，仍不能容納太甚之存在，其元老會議中重要議員十個，每於會議時必以一以余之意太甚終須加以毀滅」一語

，做如此之言行思想，真非中國人所能瞭解。我們一翻閱西洋歷史，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戰爭，有民族間的戰爭，有宗教間的戰爭，有貴族平民間的戰爭，爭端一發，非難即敗，絕無妥協並存。這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會議政體便是這種戰爭精神之產物，因為在中國歷史上，便是既得權利之保持。所以統治階級每每以特殊階級自居，與平民在法律政治社會各方面地位懸殊，自以為其地位權利為神聖不可侵犯，視平民猶如異類，平民則力圖解除此等束縛，以爭取與貴族平等之地位，並達到目的為止平等之現象重現，乃創立會議政體，一切取決於多數，並立法以限制執政者之權力，希拉羅馬及近世英法之會議政體其成均莫不如此。在中國因民族性不同，思想亦異，統治階級與平民無顯明之界限，秦漢以前，已有「民之養者自居，漢代以下歷朝帝王不止不自視為特別階級，且以「民之養者自居，唐高宗會詢某臣：「朕思養民之道未得其要，卿其為朕陳之。」見查治通鑑手頭無着不能記奏數）如法國大革命前，法國之貴族階級，從未在中國社會上發生過，全國人民普通均於法律上居平等地位，會議政體之不在中國發生，乃自然之理，因人民並不感覺有參政之需要，所以中國人有升官發財的思想，而無過問國政的熱情。當羅馬帝國征服地中海世界以後，亦曾推行其會議政體於被征服各地，但終因帝國法律公平，政治清明，人民便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對公共利益亦漠不關心，這止與中國過去之不發生會議政體同一理由。

（二）道德思想的差異：這一層理由，我在上一封信上已陳明現在為要求立憲嚴密起見，重述一次。任何一個國家政府之成立，欲維持其政府之地位權威，端賴二種力量：一為法律，二為權力。而權力互相挾制，缺一不可，而道德尤為重要，因為在當法律未實施前，權力之情況下，便不能不完全依賴道德，因為地理環境之不同，西洋人的民族性與中國人代表即其合法之政府。故不論其政府為一元政體，或會議政體，只須人民認其為合法，便可成為人民道德對象，足令人民衷心擁護，其政府之地位權威均由此而生。在中國則因自古以來，長期的處於一種孤立的環境下，人民民族國家觀念比較薄弱，於是所以所有的道德思想便不能不完全以人為對象，要成立一個中央政府，便需要一位足令全國歸心

的人，則政府之地位，始有道德上的力量，不然便無從成立政府。所以中國歷史上不能出現會黨政體政府。在歷史上每一個皇帝或攝政後，若無道德之代替者，便要發生內亂。因此時全國人民失去政治上其間的道德對象，便產生了多數作亂份子。人民政治道德的部份領袖，於是國內便形成了多數的政治重心，必須等此多數，部份領袖來併到以除最後一個後，方才多能重新成立一個全國政府。中國歷史上辛亥革命以後，一度統一，方不多如是。當如此此種公認公認，中國是一時無法行會黨政體，但一般士大夫抵死，對一元政體，仍不適合時代。所以會黨政體及一元政體均無從形成。辛亥以後，近十年之內亂，均發生於此一大矛盾中，直到一九一八年後方才打破僵局，一方面因外強之破壞，提高了人一般人的民族國家觀念，一方面因中國已產生了一位有領袖才幹的人，以其偉大的人格感化了一般頑梗的人的成見，使他們自動的服從了他的領導。民族國家的觀念及領袖的觀念合為一體，無形中傳統的道德思想在政治上發生力量，所以才能演出以藉藉落伍的國家與先進強國大戰三年，並且將得到最後勝利之歷史偉績。

(二)中國始終未曾進至以工商業立國的階段，大凡人類生活與政治關係密切，愈易發生參與政治的慾望，反之則否。以工商業為生活基礎之國家，其國民生活自康康樂樂，國民生活與政治之關係密切，且其生活比較富裕，人民知識程度較高，亦有參政能力。古代雅奧之會議政體，即在其工商業發展後，始漸次形成，而同時經營農業生活之斯巴達人，其統治權始終操於少數貴族。

以上所述之三項，第一項係論會議政體發生的原因，第二項係論成立會議政體政府在道德思想上所需之條件，第三項係論會議政體政府在經濟狀況上所需之條件。

關於第三項，中國過去之不曾成立會議政體的政府，是因為沒有發生會議政體之原因，因為人民對政治不感興趣，過去如此，今日仍然如此。在今日中國政治上活動的人及對政治發生興趣的人，只是不及全國人民十分之一的少數人，這些人實不足以代表全體民衆。以現代的的眼光觀察，人民無自治能力，對政治不關心，當然不是民族國家之利，但這非數十年的教育之功，不能改變。所以今日及不久之將來，我們仍無法

行會議政體，假若要實行，我們馬上就可以遇到一個嚴酷的事，就是中國不能承受教育的人進許多受過教育的人，都不重視那一票的選舉權或罷選權。若國，則這即是立會議政體政府之基礎。關於第二項選過了這大火災，這不，中國歷史，這二十年，個人情誼的長路，代替了二十年前的民族教育，這二十年，民族國家觀念之普遍的提高，這非五年以前我們所能想像。但，中國馬上可以進行會議政體之習慣，不能立即改革，這應新新境，中國已行了數千年的一元政體，中國人不知不覺已變成了一種立憲的概念，必需要一個適合的人在當心的地位。民族國家本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若仍由一個適合的人在當心的地位，使全民歸心發生道德的力量。雙十二事變，固然表現了中國國民民族國家觀念之提高，但亦反證了我們無論如何，少不了一位有能力的領袖，像羅馬人之以元老會議的指揮領導渡過數次困難，這在中國歷史的忠於那位代表民族國家的人。雙十二時，我們的心境實在是在這雙重的感情中，傳統的道德思想勢力之大，及其不易消滅改變，實非我們所能想像。因為我們自幼生活的環境，以及我們所有的舊文獻上，自文學正史下，民間的故事傳說，殆莫不為其滲透深入。所以若說中國在最近可以實行會議政體，是頗令人難於想像的。關於第三項，則因中國現在尚在農業經濟階段，人所共知，可以不再多論。

根據以上推論，不論就任何方面觀察，中國即應行一元政體行領袖政體，而且我們目下本來就是領袖政體，雖無其名，却有其實。若非如此，我們也演不出三年抗戰不屈的歷史偉績，同時這歷史偉績，也反證了現在的政體對我們最合適，此後我們只有就現在的政體，加以修改使其完善並確之。中國的領袖，體與傳統的領袖在組織上，自不能無異同，因為各有各的特殊條件，就行政效率而言，因國民教育程度不同之故，中國自不能與德義比，在德義他們的領袖後面，所站的是他們的全體國民，在中國領袖後面所站的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其餘的民衆又在知識份子後面所以政治效率較低。

總括上說未來的政治建設，新興的土耳其可供我們參考，俯愧的俄

土耳其的政治組織如何，我以前未注意過，在那間亦無可參看的書報，但我却相信沒有一種可以久行不弊的政體，因為奧國體有的條件不能永久不變，最重要的就是國民的知識水準要高度的提高，必須要有正確的政治知識的國民，方能依奧國體有關係條件之改變而變動其政體以適應並能對任何種體均適應不悖。關於此層，古代羅馬人可以作我們的模範，羅馬先以平民貴族之爭，所以成立了會議政體，但統治權却操之於一家寡手，治後羅馬人所組織的元老會議手，因此才不至演成種族之專民治，其後羅馬統一地中海世界以後，國版擴大，為加強統治力起見，乃由會議體改為一元之體之君主政體，以今日中國人的眼光看去，未必不認為之為開倒車，但我們不要忘記羅馬人雖開倒車，但羅馬帝國

凱行斯強迫儲蓄計劃

馬季廉

李季廉上

英國現時戰費每日約達一千萬鎊，全年約達三十五萬萬鎊。而英國稅收，就是提高稅率，施行購買稅等等以後，總共不過十三萬萬鎊；即令將人民自由儲蓄的款項全部用公債方式吸收到政府手裏，也不過四萬萬鎊。這巨大的虧空如何彌補，實是英國財政當局一個重大問題。英國貨幣專家凱行斯(J. B. Keynes)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在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了三篇文章，主張實行強迫儲蓄者來籌措戰費，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後來稍加修正，去春間編印成書，名為「如何籌措戰費」(How to pay for the War)。他用「延緩消費」字樣，意欲還是強迫儲蓄，這種籌措戰費的辦法，英國前財相西門雖然不大贊同，但是已經引起許多專家的討論和注意。現在將他的主張，辦法，以及對於這種方案的批評，介紹如下，以供關心戰時財政的參考。

在戰爭時候，如何籌措戰費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什麼人來負擔這種戰費的問題，如使這種負擔得到公平，藉此促進社會經濟的平等，也是應當注意的問題。到了戰時，國家的生產定額要增加到資源與組織許可的最高限度。有許多自己不能生產的東西，一定還要由外國輸入。由此總和除去戰爭所需及輸出的物品，餘剩下的方能供給一般人民消費，或則將人民消費的物品數量給固定起來，其餘的物品全用於戰爭。可

存在了近二千年，而他的衰亡還是亡於羅馬文化的衰老，並不由於體問題，但羅馬人之政治天才，並未隨羅馬之亡而泯滅，近代墨索里尼之建立法西斯政體，正是羅馬人政治天才之復活，我們決不能視為偶然。關於政體問題，我們已談的不少，我的意見容許有錯誤，或理論不密的地方，但我自信大致尚不十分謬誤，假若有人幸了覺得與他所聞來所知者不符，感着不快，那我就可以轉述尼采的幾句話「譯讓至今尚為最能安慰人的力量，現代人却想在真理中去求安慰，若真理不能安慰人那決不是真理的過失」。 藉此謹頌 撰安

是實際所行的大都是折中辦法。無論是二者中的那一種辦法，一般人民消費的物品都有一定的數量。戰爭時期，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是政府一切措施的最高原則。在這個最高原則下，人民消費物品數量必須由政府決定，不能因為消費者的收入或用途而影響了戰時所需要的經濟政策。這是平時經濟與戰時經濟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平時，通常生產能力都未達到最高限度，人民收入增多，物品生產跟着增加。凡是工作努力，收入富裕的人，他們的消費大致也要跟着增加。但在戰時，人民的消費數量以政府給固定了。用凱行斯的話，就是「如果我們努力工作，我們可以打勝仗，但是我們不能多消費。」因為戰時人民消費物品是有一定數量的，凡消費更多的錢來增加其消費的人，必然要侵蝕旁人的消費數額。如果全社會用錢都同樣增加，即無人蒙利，因為物價的增加恰與人民的用度增加相等。水漲船高，就是這個意思。實際上，社會中有若干人並不需要增加他們的用度。除非全部戰費皆用賦稅來籌措，「實際上這是不可以的——一部分必須靠債來彌補，這也就是有若干人要延緩消費。這不是讓物價上漲所能避免的，而物價上漲，恰好是令消費者的收入轉移到資本家階級手裏。資本家這種所得，大部分要以增加賦稅的方式納給政府，一部分自己用來消費，於是又將物價提高到不利於其他消費

者的地位。其餘的由政府借來，於是只有資本家或為政府的債權人，也就是說，只有通國人應在戰後償還。因為這個理由，工資方面因為生產程度加高，而要求增加貨幣工資，以資補償，而實際上則沒有什麼效果。

在戰爭時候，雖然工資率沒有增加，但工作時間延長與工作人數加多，工資總額一定加多；至於可供消費的貨物，則將要減少至多也不能超過平時的消費數額。結果是消費者手中貨幣數量增加，而消費物品數量并未增加。除非政府嚴格規定那種物品應當出賣及規定每種消費物品的最高價格，消費者將沒有東西可以購買。應付這種情勢，只有兩種方法。一是必須採取方法將市場上的購買力吸收到政府手裏；二是將物價高漲至可以吸收增加消費品貨物的程度，換言之，就是膨脹的辦法。後者當然弊害很多，前者比較可以施行。因此凱爾斯主張解決這個問題的原則就是要將人民增加的收入自消費方面吸收到銀行手裏。他認為自由儲蓄如能充分實行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在他分析英國國民在力量及國民收入分配之後，很明白的指出，自由儲蓄是不夠的。必須實行強迫儲蓄，方可收得效果。凱氏計劃的要點，約如下述：

首先要決定每人收入中應當儲蓄或延緩消費的比例。如果每一收入階層的這種比例規定得很正常，這種方案就有兩種好處：第一，戰時暫不消費，各人所作的犧牲，相差不甚懸殊。第二，延緩消費的另一名稱就是囤積，以前僅集中在資本階級，今後分配則比較普及。

依照他的辦法，凡是每星期有五鎊或不足五鎊收入的英國人民，應將他們的真實消費總額按照戰前的標準，儘可能的維持下去。在這個階層中間收入不足五鎊的人民，為維持其生活標準，不能令他們實行強迫儲蓄。但是每星期有五鎊以上，或每年有二百五十鎊以上收入的人民，應將他們的總消費量少三分之一，儲蓄起來。這種方案可使人民得到更比較公平的分配。

為達到上述目的，凱爾斯提議，將現行英國所得稅制度中兒童補助辦法予以放棄，對於完納所得稅及實行保險的人民，一每鎊每週補助五先令，或每年十三鎊。

【基本最少收入】(Basic minimum income)的人，不實行強迫儲蓄。他主張凡未婚者每週收入三十五先令，或已婚者每週收入四十五

三民主義週刊

先令，都可免令強迫儲蓄。如果認為這種規定不很妥當，可將超過基本最少額而進行儲蓄之比例，予以變更。

凡是超過這種基本收入的收入，應請諸政府，一部分是所得稅，一部分是強迫儲蓄。二者合併起來的百分比，視收入的增加而激勵的上升。其計算方法如下：

每星期收入	超過基本收入應行儲蓄之百分比
四五先令	百分之五
五〇	百分之六
五五	百分之八又四分之三
六〇	百分之十五
六五	百分之十五
七〇	百分之十九
七五	百分之二十一
八〇	百分之二十五
八五	百分之二十七
九〇	百分之二十九
九五	百分之四十一
一〇〇	百分之六十五
一〇五	百分之六十五
一一〇	百分之六十五
一一五	百分之八十五
一二〇	百分之八十五
以上	百分之八十五

每人收入除上述應行儲蓄於政府者外，下餘部分可用以完納所得稅及附加稅。例如，按照英國所得稅率及凱氏強迫儲蓄比例辦法計算，凡結婚者若一年收入三百鎊以上，應完納所得稅，附加稅，及應強迫儲蓄之數額，可列如下表：

每年收入	應納所得稅及附加稅	強迫儲蓄額	實餘額
三〇〇鎊	一五鎊	四九鎊	二三六鎊
四〇〇鎊	三一	六八	三〇一
五〇〇鎊	九三	七六	三〇一
一、〇〇〇	二一八	七六	四四七
一、〇〇〇	五六一	三三	二八五
一、〇〇〇	二〇五	三〇	六三〇
			二、三一五

